

Victor Segalen
Oeuvres Choïsies

谢阁兰文集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Équipée **出征** 真国之旅
Voyage au pays du réel

[法]谢阁兰(Victor Segalen)著 李金佳 译

真国之旅
出征



ÉQUIPÉE

谢阁兰文集

VOYAGE AL PAYS EN LIBERTÉ

[法] 谢阁兰 (Victor Segalen) 著 李金佳 译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出征:真国之旅/(法)谢阁兰(Segalen, V.)著;

李金佳译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0. 6

(谢阁兰文集)

ISBN 978 - 7 - 5458 - 0243 - 6

I. ①出… II. ①谢…②李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
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0040 号



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Shanghai VI Horae Publishers, Inc.

谢阁兰文集

出征:真国之旅

(法)谢阁兰 著

李金佳 译

责任编辑 杨英姿

特约编辑 吴雅凌

封面设计 吴正亚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

印张 6.125

字数 84 千字

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

ISBN 978 - 7 - 5458 - 0243 - 6/I · 95

定价 22.00 元

译者序

对维克多·谢阁兰(Victor Segalen, 1878—1919)的重读和再评价,是近五十年法国文学界和批评界的一件大事。今天,我们谈论近现代东西方文化、文学交流、乃至这一交流所引发的诗歌流变时,迟早总要说到谢阁兰。许多评论家认为,谢阁兰以他全部的写作和生活赋予“异国情调”^①这个概念的充满个性的新意

① “Exotisme”,谢阁兰美学的支柱性概念,这个词在汉语里通译作“异国情调”,译者暂从众。在谢阁兰笔下,“exotisme”的外延极度扩张,不仅可以用来描述跨国度、跨地域的文化关系,而且自然之于人、古人之于今人、女人之于男人,甚至自我之于自我本身,都被他放到这个概念的框架下思考。鉴于这个词所获得的 (转下页)

义,无论从思想史还是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来说,都是至今为止东西方交会所产生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。从1990年代起,谢阁兰的小说和诗集开始翻译到中国^①,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:的确,奠定谢阁兰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几部作品,都同他在远东、特别是在中国的经历密切相关。

谢阁兰早年接受正统的医学教育,一生以行医为业,可是他的志趣,却全在文学、艺术和哲学方面,这在1898年至1902年他就学于波尔多海军医科学学校的时候,就已露出端倪,并且随着他人生的进展,愈来愈显明。可以说,从青年时代起,谢阁兰就把自己定义为一

(接上页注①)这种空前的丰富,黄蓓在她最近翻译的几种谢阁兰作品里,没有沿用“异国情调”,而是选择“异域情调”译之。我国论者引据谢阁兰时,有时也用“异国主义”来译“exotisme”,不甚可解。另,谢阁兰作品的另一个关键词“divers”,在法语里是个兼有杂多、纷纭、差异等多种含义的形容词,常被作者用作名词,并带上哲学的含义。这个词,前辈译者常译为“多样”、“多样性”,或“多元”、“多元性”,黄蓓译为“万象”、“多异”,都是说得通的方案;在汉语里与“divers”比较近切的词,是“纷”,惜其用于译文过于生涩;本译本为简易起见,姑译为“多”。

① 谢阁兰的文学作品,现已译成汉语的有:《勒内·莱斯》(梅斌译,三联书店,1991年),《碑》(车槿山、秦海鹰译,三联书店,1993年;台湾另有林惠娥译本,题为《古今碑录》,台北中央图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)。此外,谢阁兰从1909至1914年寄给妻子的信,也以《谢阁兰中国书简》为题,被译成汉语(邹琰译,上海书店,2006年)。

个诗人和思想者，他一生的交游与写作，也主要是面向巴黎的文化界，努力求得其他文学家、艺术家的承认。谢阁兰这种人生定位第一次与中国钩连，是在1902年他大学毕业后，作为海军一等医师，随都兰号赴任塔希提岛的途中：当年十月，途经旧金山港时，谢阁兰因身染伤寒，不得不在当地羁留一个多月；病后修养的空闲，他每每在当地的唐人街度过，华侨的生活、风俗、手工艺，特别是戏剧，都引起他兴味盎然的观察。这样，当谢阁兰结束海外任期，在1905年回到法国，开始比较密集的文学创作，渐渐熟悉了巴黎文坛的路数，并且不可遏止地厌恶起充溢着文坛的浮华而沍滞的风气时，他就渐渐萌生了去远东——对他来说那里代表着巴黎的反面——任职的念头。从1908年5月起，谢阁兰开始学习汉语，受业于东方语言学院微席叶（Arnold Vissière）教授，在法兰西学院旁听著名汉学家沙畹（Edouard Chavannes）的课，并结交了考狄（Henri Cordier）、拉卢瓦（Louis Laloy）等汉学界人士。1909年3月，谢阁兰通过了海军部“见习译员”的考试，以进修汉语的名义调任中国，于同年4月从马塞出发，6月中旬终于抵达很久以来就魅惑着他的北京。

此后的5年间,除了几次回法休假和在日本、东南亚的短期旅行,谢阁兰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,一直到1914年8月他因一战爆发的缘故被召回欧洲。在华期间,谢阁兰先后作为法国驻华使团的见习译员、北洋医学堂的教官,袁世凯长子的私人医生,居住在北京、天津、山海关、河南彰德府等地,并且多次在中国各地旅行,可以说对当时的中国,他有着比较广泛和近切的了解。在中国的这五年^①,是谢阁兰文学创作的旺盛期,他的诗集或散文诗集《碑》、《画》、《颂》、《西藏》,小说《天子》、《勒内·莱斯》,还有这里翻译的《出征》(*Équipée*),都完成或酝酿于这个时期。

《出征》的第1章里讲到,这本书是“旅行和历险的记述”。确实,《出征》的写作,直接源于谢阁兰在中国西部的长途旅行。在中国居住的五年间,谢阁兰曾经两次纵穿中国中西部和西南部数省,而每一次旅行都耗去他半年的时间。1909年8月,谢阁兰刚到中国不久,就同好友吉贝尔·德·瓦赞(Gilbert de Voisins)

① 1917年2月至1918年1月,谢阁兰作为海军军医,第二次被派驻中国,负责检查中国赴欧援战劳工。利用这次居留,谢阁兰对南京一带的梁代陵墓雕塑做了考察。

结伴,从北京出发,经五台山、太原府、西安府、直上兰州,在那里盘桓一周,又于10月末南下四川,至成都府,沿岷江到乐山、峨眉山,再到重庆,于次年1月由宜宾乘汽轮顺江而下至上海。这是一次以驰目骋怀为目的的漫游,谢阁兰在当时寄给亲友们的信中,详细地描述了沿途的见闻和观感,而他1910年写成的随笔集《砖和瓦》,也以这次中国腹地之旅为素材。1914年初,谢阁兰第二次不辞辛苦,踏上了中国西部的长路。与1909年不同,这次旅行有着明确的科学目的,就是根据中国古代地方志的记载,在陕、川两省,搜罗、描述中国古代特别是汉代的建物石刻,连带勘测金沙江从丽江到巴塘的水道。考察队的领队有三人:谢阁兰、吉贝尔·德·瓦赞和地理学家让·拉第格(Jean Lartigue)。谢阁兰是整个考察活动的灵魂,1913年7月他在法国度假时,就已订下一份明确的考古计划,并多方奔走,获得了考狄、沙畹、塞纳(Emile S  nart)等东方学界权威的支持,并且争取到法国铭刻美文研究院和国民教育部的赞助,以及法国美术与考古图书馆的津贴,使这次考察活动带上很浓的官方色彩。考察团于1914年2月1日从北京出发,先乘火车南下河南洛

阳,参观龙门石窟,再从那里徒步西折入陕;三月上旬,从西安沿渭水西行直至宝鸡;而后度秦岭,在三月下旬至汉中府,遵旧官道入四川;四月间,考察队经宝宁府,顺嘉陵江水路赴蓬安县,再循陆路至渠县;5月初至成都稍事休整,旋即东北上,赴绵州、梓潼;6月初,折回成都,乘帆船下岷江,向嘉定府进发,复由嘉定至雅州,在6月27日,基本结束了考古工作。7月4日,考察队抵打箭炉,本拟径赴巴塘勘测长江上源,可是因江卡一带藏民起事,不得不改而南下丽江,欲由丽江循江上溯至巴塘。8月上旬,谢阁兰一行到达丽江时,接到欧战爆发的消息和动员令,匆匆结束了考察活动,取道昆明直奔越南河内,最后从那里乘船返回法国。考察活动因中途停止,没有实现第二个目标,即对长江上游的勘测;但在考古方面,却成果甚丰,而考古工作正是由谢阁兰主持的。特别是,谢阁兰对陕川两省皇陵、石刻、崖墓和佛窟等古代遗存所做的定位和研究,对当时欧洲汉学乃至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,均有贡献^①。谢

^① 比如,当时西方对东亚造像的研究,最早上溯到公元118年。而考察队对霍去病墓“马踏匈奴”石塑的描述,把这个上限上推了200多年。另外考察队对渠县汉代碑阙的调查,也比较重要。

阁兰在旅途中,做了详细的旅行日记,并且追述一切与这次考察活动有关的经历,集为一厚卷,题为《路条》。回到法国后,他总结和拓展此次考察旅行的成绩,写出《中国西部考古记》^①、《中国,伟大的雕塑》^②等几种著作。这里翻译的《出征》,也取材于1914年的这次旅行,间或亦可寻见1909年旅行的影子。

从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看,《路条》与《出征》既有明显的亲缘,又有根本的不同。简言之,二者孕育于同一个旅行的子宫,写作时期很接近,在内容上也有所重合;不过,《路条》是一本考古学者的日记,杂而又杂地记录着沿途一切所见所闻所想;而《出征》是一篇深思熟虑的文学创作,处处倾向于诗所特有的统一和纯粹。对《出征》第一次明确的提及,见于《路条》1914年5月

① 这个首先发表在《亚洲学报》(*Journal Asiatique*, 1915年5/6月刊、9/10月刊, 1916年5/6月刊)的长篇考察报告,在1930年被冯承钧译成汉语(《中国西部考古记》,商务印书馆,尚志学会丛书,民十九初版,民廿一年重版)。另外,1914年考察队沿途拍摄的大量照片,在谢阁兰逝世后,由让·拉第格整理成两大开本,以《谢阁兰、吉贝尔·德·瓦赞、拉第格中国考古考察团:图片册》为名,于1923年在巴黎 Paul Geuthner 东方学书店出版。这些照片多出谢阁兰之手,在文献性和艺术性上价值都很高。

② 这本书从1917年上半年一直写到1918年10月,由于谢阁兰的逝世而没有最后完成。

3日,正在行旅中的谢阁兰,为这本书勾画出大致内容和主要趣旨,特别是它所要探究的“问题”:想象与真实之间的关系。然而,早在这次旅行刚开始时,甚至在它历时数月的准备阶段,谢阁兰就已对《出征》做出许多片断式的构想,这从《路条》1913年9月到12月的录述中,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。因而,在1914年6月下旬,当考察队的考古活动基本完成,谢阁兰从旅途的劳顿和研究的繁忙中稍得余暇时,就立即从《路条》中抽出若干段落,把这些原始的素材充实和升华,写起《出征》这本揣摩已久的书来。一战爆发引起的变故,使《出征》的写作一度中断,直到1915年1月谢阁兰携家眷回到法国,在布列斯特安顿下来后,才重新接续起来。《出征》比较成熟的手稿本,完成于1915年2月。在1916年11月第二次赴华前夕,谢阁兰又对它做了一次通读,从那时起直到他1919年逝世,这个手稿没有经历大的改动。

与一般的游记不同,《出征》对旅行的书写,不是纪闻式的,而是反思式的,它的目的不在于描述中国的现实,或者从某个既定的观点出发品评之,而在于省察这个现实如何在作者的内心深处留下轨迹,这个轨迹又

是如何同作者早已踏上的那一条精神历程相交会。在谢阁兰的眼中，中国是一个契机，激发他带着新的眼光、从新的角度，去思考很久以来就困扰着他的各种基本问题：文学的真实和虚假，词语的伟大和脆弱，形式的短暂和永恒，认识力的万能和无能，记忆的消泯和复生，还有价值的相对和绝对，还有这凝结与流动之间的“我”……一个思想者所面临的这些核心问题，都在《出征》里，以穿越中国的一次旅行为导火索迸发出来，得到热烈而深入的探讨。从“作为我的契机的中国”这一点来看，《出征》同谢阁兰其他的作品——尤其是《碑》和《勒内·莱斯》——一脉相承，甚至可以视作它们的一个综合，而且是一个凸显的综合，因为，隐约在这些作品中的各种念头，在这里会合成一条绵延不绝的思路，因为，在谢阁兰的所有作品里，《出征》里的“我”最是谢阁兰本人。谢阁兰的中国，其实不仅是他想象的对象，更是想象的原动力；不仅是写作的素材，更是作为一个支点——几乎是唯一的——支撑着写作行为本身。而中国之所以能提供这样一个契机，是因为谢阁兰有一个执着的信念：最坚密最幽深的“我”，必须被投掷到最错杂最纷纭的“物”——也就是他常说的“世界

之多”(le divers du monde),也就是《出征》里讲的“真实”——中间,才能获得一个衡量自身的尺度,一条认识自己的途径;而中国,以它久远的历史、广阔的疆域,以它内部的千差万别,以它与西方相比处处可见的“异”,最能代表“世界之多”,最配得上“真实之国”这个名字。这个想法,早在1908年谢阁兰初学汉语时就已形成,并在他致儒勒·德·戈梯埃、致德彪西的信里,以及《异域情调论》中得到现已几乎成为经典的表述。《出征》的头两章,也讲得相当清楚。

既然中国被当作这样一种契机,既然与“多”的际会总在于生发“我”,《出征》这样一部作者本人的切身之作,就在叙述这场穿越真实之国的旅行时,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写作手法。每一个经历的记述,每一条河每一个山口每一座大城或驿站,都既是外也是内、既是行也是思,而物我之间这种一刻不停的盘旋,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张力;纯粹意义上的“风景”,在《出征》里是寻不到的。在表面上,整本书虽然以旅途的阶段为进程:从旅行的起因、准备,它写到启程、最初的几段路,再写到山关滩险、一个个关键时刻,连带着草鞋木杖一应细节、浆手驮夫一干人物,最后写到回归;可是,我们

仔细看时就会发现，旅行中每一个外在的因素都写得很朦胧，指实的能力非常单薄。通篇没给出任何一个时间，告诉读者这次旅行在何年何月进行，更未指明这一次攀登、那一次相遇究竟发生在哪一天；也没给出任何一个地点——除了北京、西藏、婆罗尼斯这样象征化了的称谓——能容我们为这次“出征”勾勒出一条路线，哪怕是在最含糊的地图上。而书中提到的人名，是波德莱尔、兰波、马拉美、克罗岱尔等前代作家，或者冯焕、冯缙这样传说化了的历史人物，至于旅途中活生生的人，全都没有名字，传教士就只是“传教士”，姑娘就只是“姑娘”，他们与其说是一个个人，不如说是一类类人。在时空、人物上的这种晕化甚至幻化，由于一些文学神话原型的引入，得到进一步加强，比如第20章中迷路的我在黑盐洞的桃源之游，第25章中我与非我在世界尽头的邂逅，都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。通过这种“非指实性”的游记写作，谢阁兰时刻都在提醒自己连同读者：“不要蒙蔽于旅行”，不要被一日日的“柳暗花明”所眩惑，更不要睁着一双貌似“率真”的眼，在未知之地上追寻那些所谓客观的印象。执着于一个剔除了思考与想象的“外”，甚至狂妄地用仪器、图表去“辖

制”它，这只会使我与物之间的伟大际会，塌缩成一串重复着的名词和数字，而这些名词和数字构筑成的“真实”，在旅行开始之前就早存在着了，被众人的嘴保卫得牢不可破。这样的真实，其实是一种虚构，是别人的想象的一个“陈迹”，“可疑而又虚妄”；它虽然是生活既定的基础，但不能成为认识的真正对象，更不值得用行走的脚去探索、用跋涉的笔去描述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《出征》这本“非指实性”的旅行记，正是作者从深层贴近真实的一种尝试，因为真的真实不是一个惰性的“名”的世界，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“命名”过程，其中有物，有我，有一种超越物我的磅礴的整合力，使它永远丰富而危险，永远值得人去“征服”。

在同这永恒地异于我的真实的交接中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动作——或描画，或拍摄，或引用，或感动涕零，或顾左右而言他——，这动作周旋于未知和已知之间，实现着“知”，也构成了这个人在“知”上的人格。而谢阁兰的这个动作，是“鉴定”，冷静地，“矜持”地，以他全部的感觉和思考。在《出征》里，“鉴定”(expertise)是一个关键词，几次出现；在最后一章里，作者又回到它上头，并对它的方法做了一个形象性的描述：

我无法饮而不品，享而不尝。我无法在看时不太过注目，在听时不倾耳，在闻时不后退一步闻个仔细。^①

对踟躅于真实之国的旅者来说，这以退却开始的接触，这先天地参入了反观的观，是“唯一可行的鉴定法”，只有它可以避免武断，避免把辛苦赢得的“多”归结为一个是非。也只有它，才配得上这次“鉴定”的课题，这个课题——被抛到真实之前的想象——对谢阁兰来说，是太重要了：

想象会衰退还是加强，当它对质于真实之际？^②

这个疑问，在一个毕生都在想象、毕生都在寻求以想象抓住世界的作家那里，实在可以说是性命攸关的。《出征》的头几行，就把这疑问提了出来，而之后的各章，又一遍遍以不同的形式表述之，比如：

① 见本书第28章。

② 见本书第1章。

在被质于事实时，概念与实物究竟怎样符合？何处能寻得连接两者的链条，何处是真实的确定——或彷徨——之地？^①

对想象与真实、词与物之间关系的这一鉴定，或者说做出这一鉴定的种种尝试，构成了“我”远行的缘由和目的，赋予每一程每一里以意义，而“我”在不可避免的归来时所感到的“幸福或不幸福”，也全以这一鉴定的结论而定。

久居于“瓷室”之中、惯于驱遣词语的谢阁兰，面对这个问题，是倾向于维护想象的，倾向于断言想象在对质于外部的真实时，会变得更强大，会统摄真实甚至生成真实。真实对于想象的依赖，作为谢阁兰的一个基本美学观点，贯穿在他所有作品中，而《出征》第23章，正是这个观点非常凝练的体现。更何况，在《出征》起初的写作计划里，想象和真实之间历时数月的争执，最终以想象“逐渐占据上风”为终结，虽然在真国之旅的途

^① 见本书第4章。